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
之二

中英系研究组文系译修组用
苏联专家莫加酒莫娃独
中文系翻译室



中英系
专家
中文系

北京师范大学文系教材
1956—1957学年度第二学期

文学史第二十五讲

B. G. 柯尔尊

荷拉其米东·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 罗连科(1853—1921) 的创作道路

柯罗连科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列宁把他看作是“进步的作家”，民主主义者推崇，因为在同专制政府和反动制度的斗争中，他的创作曾给与俄国社会以巨大的支持力量。

柯罗连科是高尔基的导师之一，高尔基在其他一些著名的和与自己接近的俄国作家中向对于柯罗连科是另眼看待的。高尔基关于柯罗连科说道：“他……对我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还是在我所遇到的千有个人物中的最完善的人；对我来说，他也是俄国作家的理想形象。很长的时候不会有像他这样的作家，将来是否能会有呢？……我对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任的情感。俄国许多的文学家都是友好的，但是其中没有一个能使我对他产生如此尊敬的情感，譬如或同柯罗连科第一次相遇时使我对她所产生的那种尊敬的情感一样。他当过我的导师，时间虽没多久，但总是导师，而且直至今日依然使我感到骄傲；我这样说，是够毫不誇大的”（高尔基，1925年10月8日致柯罗连科的信）。

在柯罗连科的风格中，非常动人的是他的严整性和高度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无论是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或在他的政论中；以及在他的生平功绩中都曾表现了出来。柯罗连科在作为政治流刑犯被充配到极北地方时，曾经历过许多的体验。柯罗连科的创作是在文学中颓废派潮流迅速加剧的时期中展开的。但是他仍然忠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伟大古典作家的道

训，虽然他维护和丰富批判现实主义。

柯罗连科是尼·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加尔施以茨许多其他著名作家的同代人。他们的创作是与俄国历史的转变时期（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相联系的。柯罗连科论及加尔施时所说的一些话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适用于他自己：“她的生活和作品同出于一个源流；所以在谈到她的生活时，就不能不同时谈到她的作品，反过来也是一样”。

X

X

X

符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生于热拉米尔斯市的一个县级法官的家庭里。父亲出生于贵族，但是柯罗连科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农奴。在家庭中充满着民主主义的气氛。在父亲死后，家庭又遭受了巨大的困难和物质上的艰苦。

柯罗连科的家庭是和睦的，有着尊重劳动的习惯，真诚的精神和对自然的热爱。柯罗连科是在与普通人们的密切交往中长大的，他终身都铭记着母亲所讲的故事和童话。后来就在私立寄宿学校中，在热拉米尔斯和罗夫诺西地区的中学中继续地学习着。在求学的年岁里，少年的柯罗连科曾详尽地了解了沙皇俄国的残酷的生活。

教师B·阿夫几也夫对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给他介绍尼·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尼基津、列察洛夫、比谢木斯基等人的作品。乌克兰诗人T·舍甫琴柯的短诗和史诗引起了他的“热爱和讚美”。而杜勃罗留波夫和别林斯基的论文在他的世界观中却引起了转变。“我找到了自己的祖国，当我读过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时，——柯罗连科写道，——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和主要的教师”。别林斯基对他也成了“最高的权威”。

第二十讲

她的结论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位未来作家的美学观点的内容。

柯罗连科在下面的话中强调指出了俄国文学对于决定他终身创作的巨大意义。她强调说：“我那时找到了自己的祖国，而俄罗斯文学首先就成了这个祖国”。

柯罗连科的艺术思维、形象思维的才能很早地、而且是很有力量地就开始发展起来了。他是先在思想上描绘出一幅图画、进行叙述，斟酌称“语句”，但并不急于马上把这些转写在纸上。

在1871年柯罗连科在罗夫诺莫科中学毕业了，并获得了银质奖章，而后又进入了彼得堡的工艺者科学校。他非常勤勉地热心于学习，很喜爱当代的先进杂志“祖国记事”。这体来说当时是由奥克托皮夫和萨尔斯基夫一谢德林领导的。

生活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柯罗连科曾得了重病。病年之后，他的家庭定居于彼得堡。曾不得不抛弃学业而偶然地给人做些制图和翻译的工作。

在1874年，柯罗连科来到了莫斯科，並进入了彼得农林学院。著名的学者K·A·季米良拉夫成了他的教师。柯罗连科渐渐地参加了大学生的革命运动，倾向于民族派。因为积极地参加了大学生的学潮，他就被流放到伏洛高维斯克省去了。不久，流放就因为让他在警察的监视下居住于克隆斯达特。大约一年之后，柯罗连科就回到了彼得堡，并进入了矿产学院。在这个时期他继续倾向于民族派。他用以下的话表明了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兴趣：“改变自己的生活、思想是与或多或少有些朦胧的改变整个社会的计划有关的”。

柯罗连科是非常关心先驱力量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一切事件，他曾参加过大学生的集会，参加过奥克托皮夫的葬礼，

被遗弃了。心地失了“到民间去”的决心，因而学习了制版的工具，他尽力想同普通人们，同手工业者接近。同时文学兴趣也吸引着他。他从外文翻译了一些书籍，还作过校对员的工作。而在 1878 年在“新前”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为什么要消灭贫民辩护的评论。同年在“话”杂志上刊登了短篇故事“‘探求者’的生活插曲”。这是一篇关于描写一个去探求真理和幸福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主人公认为，如果在一对青年人中间没有精神上的接近，没有共同的生活目的，那就不可能结婚。作者提出了关于必须把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问题。

这个第一篇故事曾引起了反动批评家的注意，他们对它发了尖锐的批评。

在刊物上出现柯罗连科第一篇故事的那一年，他的整个家庭（几个兄弟和亲属）都被流放到维亚特加省去了。柯罗连科的家庭早已被当作“不可靠的家庭”而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了。当警察四处搜寻印刷革命书籍的秘密印刷厂时，曾注意到柯罗连科家中的一切成员几乎都是制版工校对员的工具。因此又有可能来帮助秘密印刷厂。这一类的嫌疑也就足以使全家都被流放到荒僻的格拉格夫县去了。

柯罗连科在遭受了警察的极端粗野的横暴压迫之后，更加相信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必要性。后来由于同人民的接近，就帮助他抛弃了民族派的幻想。在流放的年代中，柯罗连科已成长为一个艺术家了。他非常注意于记载所见到的一切。

柯罗连科在从事制版职业时，为自己谋得了生活资金。同时也就帮助他同居民们接触，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不久由于一个警官告密，控告柯罗连科对政治流犯发生了不良影响，说他傲慢无礼，于是他就又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到了一个极北县城——白桦屯。

这是一个贫瘠的沼泽地区，居民都无文化。在这里没有见过带轮的马车，谁也没有穿过皮鞋（他们的都是穿树皮鞋）。柯罗连科当时是住在小茅屋中，屋里的火炉没有烟囱，所以屋内总是烟气不断。而就在这种条件下，冬天还要把牲畜圈起来，让它取暖。

柯罗连科在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详细地研究了他们的生活，更广泛地敞开了“民族解放幻想”。在那些年代中，他已经深信，人民是处在愚昧无知和极端黑暗的境地，但同时他们也保存有巨大的创造力量，富有着各种的才能。所以他就加强了柯罗连科的信心，使他願意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这时期中，柯罗连科创作了许多的作品——短篇“在白桦屯”，中篇小说“时代”，短篇故事“奇女子”。但是这些作品未被发表。

在1880年，由于警长的诬告，柯罗连科又被逮捕了，又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移民区去了。他辗转于流刑监狱之间。但是不久他就被遣回圣尼古拉耶夫斯克了。在这里他继续从事着文学工作，他的一些作品开始付印了，如短篇故事“奇女子”，短篇“不真实的城市”，短篇故事“候审室中的暂时居留者”。

短篇故事“奇女子”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代表作。在这篇故事里，作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鲜明的革命姑娘的形象。瘦小的、娇弱的姑娘具有着驚人的忍耐力，坚定性，以及不动摇的意志力量。什么東西也不能改变她依照着而走来的同专制制度及其奴役农斗争的道路向前进的决心。

柯罗连科在故事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中描绘出了他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情緒和心情。当1881年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位时，

柯罗连科拒绝了向他宣誓。他的理由是：自己曾遭受到了专横和强暴的待遇，所以他认为忠实地这种制度。他写道：“如果想真诚相信，那种最伟大的力量是在亵渎您的神聖时，那么在这种力量面前您是不会安然不屈的。”

結果，他重新被捕了。年轻的作家被流放到東部西伯利亞。长期的监禁生活，不断地转乘于流刑犯车厢之中，跋涉于驿站旅途中，这些就使柯罗连科获得了用未創作艺术作品的一批批新的材料。他曾同当代的许多著名的革命者，首先是民族主义者交往。他彻底了解了东部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悲剧是“不與人民参加的斗争的悲剧”。

柯罗连科在襟襟下乘马走了三千俄里，终于到了一个荒僻的边疆五库梯省，依靠以极大勇敢和坚贞精神忍受了沿西伯利亚五大河列诺河的一条在冬季旅行的道路上的千辛万苦，在荒僻的村镇阿姆加的生活也是不容易的。而柯罗连科则是生气勃勃的，精力充沛的，喜好工作的人，他永远保持着冷静的心情，永远是宁静而愉快。因此无论是政治犯和刑事犯都很喜爱他。

柯罗连科继续紧张地工作着，收集着材料，作些评论，进行观察，並写了许多的东西。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如：“马卡尔的梦想”，“鹰”，“杀人者”，“流浪者的婚事”，“机床工人”，“在坏伙伴中”等）都是在文里创作的。其中的某些作品后来又加以改写，並改用其他的名目出版了。

在1884年流放期满，作家就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去了。随后的几年是他生活中最幸福的几年。他“与一个心爱的女人结了婚，全身心从事文学”。但他不是馬上成为职业作家的。他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做过事务员的工作。在1885年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刊载了柯罗连科的短篇故事“马卡尔的梦想”。这篇故事马上给作者带来了文学的声誉。而后

第二十六讲

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鹰”，中篇小说“森林伙伴”，而在1836年，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盲音乐师”。在这一年他的第一部书“随笔和短篇故事”出版了。

柯罗连科的家在瓦日尼·诺夫哥罗德城已成了城中文化生活的中心，成了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收容所。关于这点，警察局局长曾向沙皇密放说：“柯罗连科的家在瓦日尼·诺夫哥罗德好像已成了由俄罗斯出来的一切流刑犯的驿站，成了住民瓦日尼·诺夫哥罗德城中的不可靠分子的会聚地矣”。

高尔基在八十年代末也在这里住过。他碰见了一个矮壮的，筋骨裸露的，有着一双愉快眼睛的，有礼貌的和质朴的人。柯罗连科是那些在八十年代的极端反动的时刻中没有低头屈服的作家之一。他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上和人民中唤醒公民的自觉心”，为此进行了“鏖战”。柯罗连科对于政论文章花费了很多的创作力量和时间。他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抨击贵族时代”，要揭露农奴制度。他在自己的以各种化名发表的论文和政论中，痛斥了贪婪的反动者，描述了住在伏尔加河中流一帶的那些死于1891——1892年饥荒的农民们的悲惨情景。柯罗连科虽到各地去，花费了许多的努力来开办慈善食堂。同时他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防止饥饿的措施是有其局限性和缺点的。他苏憎恶地谈到了反动的地主们，他们的排挤农民，指责农民懒惰和不愿意工作，还认为他们本身就是饥荒扩大的原因。他得出了结论说：“和严重的贫困……成正比例的完全是歉收的程度，而主要是地方官吏的残酷剥削的程度”。

由丘波上发表的一些零篇论文汇编成了一部书，叫做“饥饿的年代”。这部书是对民族派观点的有力的打击。作者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证明了：“在公社中已确立着剥削的生产”，“

一致的，没有区别的农民，单纯的农民——这是根本没有的；而有的……则是富人、商人、贵族和贵族……，主人和做工人者”。

稍后，柯罗连科又创作了一部新的随笔体裁的书，叫做“霍乱六年”。这部书是作者根据自己所见到的1892年霍乱流行之时居民们的悲惨情景而写成的。

在许多年的大作中，依藤周造了俄国的许多荒僻的角落，研究了人民的生活，祖国的自然，且对本国史发生了兴趣。他遇到了凡·托尔斯泰、契诃夫、乌斯宾斯基，给许多的杂志撰文稿。对柯罗连科来说，有着巨大意义的就是在阿斯特拉汗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会面。柯罗连科很尊敬和喜爱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在亚麻株就曾听到了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许多传闻。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在那裡住了许多年。“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才，最热烈大式的天才”——他关于柯罗连科写道；并对他的这大的文豪的前程表示了信心。

柯罗连科成了年轻的高尔基的导师。由于他的推荐，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伊席吉尔婆婆”在“俄罗斯公报”上刊登了，而在1895年，又刊登了短篇小说“契尔卡什”这个短篇小说奠定了高尔基的文学声誉的基础。后来他在谈到柯罗连科在自己生活中的作用时写道：“她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给了我很多的指示，教给了我很多的东西”。

在1893年柯罗连科又作了一次国外的旅行。他到了瑞士、丹麦、英国和美国。美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报刊的可收买性，无所不入的资本的权力，失业现象，压害黑人——都受到了作家的直接的谴责。这次旅行的结果，就是写成的关于描写在美国的俄国移民的一个短篇故事“哑口无言”。

在柯罗连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参加了那涅摩尔涅斯克的审判。烏德摩尔涅斯克民族的几个人被指控犯了杀人以谋

诸神的罪名，柯罗连科很关心这一案件，因为反动者曾广泛地利用它来镇压少数民族和推行殖民政策。尽管乌德木尔丹人受过两次审判，然而柯罗连科在到达了当地后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之后，就力求达到第三次重审这一案件。在这次审判中他曾以辩护人的资格出席了，并发表了一篇充满不可反驳的事实的演说。被不公正地判了罪的乌德木尔丹人宣告无罪了。柯罗连科在刊物上说明了这一案件的一切详情，这一案件在俄国和国外的刊物上曾得到了广泛的反应。

摩尔坦斯克案件曾给了外国刊物一种藉口，用来诽谤和指责俄国人民，说俄国人民粗鄙和野蛮。因此这一事件的公正的判决对于维护民族的尊严来说是很重要的。

作家对于反动派联合势力的英勇反抗——这就是能够说明柯罗连科极端勇敢和品格高尚的业绩。他的声誉和威信日益增长和巩固了。

作家生平和创作道路的各个基本阶段就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她的早期作品和在90年代间写的东西中，有一些是具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的方向。例如，短文“海”就是这样。在这篇作品中作家描绘了一个航行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人，那般不屈的逃亡者。作者很赞美这个逃出黑暗监狱的人。他不畏死地个对个地同大海搏斗，渴求着自由。

在1886年出版了“女花神的传说”。在这部作品中，玛丽赫姆，这位为解放人民而同压迫者作斗争的战士的浪漫主义的形象，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柯罗连科后来关于这个理想的主人公的形象曾写道：“我以为，我相信，我深信在理想的人物形象中，佔着正常地位的正是对暴力的憎恨和怒愁，正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独立和自由而倾倒献自己生命的永无的关心。这种形象就是品格完善的人的榜样”。

故事「馬卡尔的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兴趣，为柯罗连科开掘了通向「大」文学界的道路。先的主人公是住在五座梯的一个俄国移居农民馬卡尔，他「拼命工作，受着艰苦的生活，忍受着贫困和饥饿——一輩子受到损害……他的受到村长、首长、陪审员、县警局的损害，这些人逼着他的交税；他们受到神父们的损害，神父们要他们捐钱给教会；他们受到贫穷与饥饿的损害；他们受到严寒和溽暑，水灾与旱灾的损害；他们受到冻结的大地和险恶的大森林的损害。（引自俄译「柯罗连科」第十八页）。

斯柯金娜往前走去，看着大地，不知道他们会把他赶到哪里去！还有他！」

馬卡尔的生活是可怕的而艰苦的；正如人民中许多类似他的人的生活一样。但是作者指出了，即使在这一个受压制者的心里也觉醒了反抗的意识，觉悟到他被通过这种生活是不公平的。

在故事里广泛地运用了民间传说、童话和幻想的主题。馬卡尔梦见他自己死了，被送到上帝那里去受可怕的审判。他站在至高无神的面前，勇敢地谴责了执政者和法庭的不公平现象，为不幸的人们和自己本人辩护。馬卡尔懂得「他生下来是和别人一样的」——他有明亮的、睁大着眼睛，在眼睛里反映了大地和天空，他有纯洁的心，願意接受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他那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心里已经忍无可忍了。」

农民的生活是和大自然分不开的。在大自然里，作者找到了绝妙的景色和能够帮助他揭开被压榨者的觉醒意识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以文辞高度抒情诗似的激动心情描写了自然景色，特别是馬卡尔眼前的日出时的景色。「最初，从地平线上射出了几缕光芒，它们很快地就铺满了天空；而快明亮的霞光来得

第二十五讲

然无光了。于是星沉了，月落了。积雪的原野变暗了。这时候在原野上昇起了雾，像可敬的哨兵那样站在原野的周围。但是在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在东方，雾轻柔地飘动起来，好像金甲的战士在向山谷致敬。从它下面昇起了太阳，先站在金光闪耀的峰顶上环顾原野。一种空前未有的，骇人眼目的光耀照耀着整个原野。雾又像一个极大的环圆似的庄严地上升着，向西扩散开，飘向天空直上天穹。马卡尔似乎听到了美妙的歌声。这似乎是那一支久已熟悉的，每次大地欢迎太阳时唱唱的歌。但是在这支马卡尔从未没有给它应有的注意，这是第一次才懂得了这支歌是多么美妙。她站在那里倾听着，不愿意再往前走了，她愿意永远永远站在这里倾听着。」

这样，作者以极大的技巧运用了风景来阐明作品的基本思想——被压迫人民的意识的觉醒。

在塑造马卡尔的形象时，柯罗卓科力求强调社会的反抗情绪，这种情绪在人民中甚至在最愚昧无知的人中间都已经产生起来，巩固起来了。

这一思想含蓄在美妙的传奇小说「林喻」里。在这部小说里谈到了被侮辱的和被压迫的人民对有权有势，残酷成性的老爷而进行的裁判：在故事「鹰」里塑造了以「瓦里·沃留什卡（意志）」为名的，克服了各种难以置信的障碍和困难的流浪人的鲜明形象。

在故事「嬉游的河」里，柯罗卓科塑造了强大的，能建功立业，能够作出伟大事业的人的形象。作者虽然没有看见俄国农民的性格和他们的的豪爽态度，但是同时必须指出最主要的东西——强大的，尚未觉醒的，当时情况还没有能很快地出现的那种潜在力量。

在中篇小说「城中恶霸」里，人物中间的八个坏人的形

象站著中心地位。农氏馬特威·洛赫斯基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而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紐約——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中心之一。一开始的时候，不正确的，不习惯的新生活竟直把洛赫斯基弄得晕头转向，但他逐渐仔细地观察了先，于是开始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许多缺点。

作者对资产阶级民主者表示了否定的态度，指出了，在美国「谁都一样，只要能找钱」。小说的主人公相信美国的自由是虚妄的，这是一种公然共存掠夺的自由——「人们互相切断咽喉——这就是自由。」

馬特威变成了无数的失业者中的一员，流浪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街头。他和其他一些无家可归，没有栖身之地的人一起参加了失业者大会。逐渐地，在过去曾是农民的这一个人身上产生了由于贫困而要和伙伴们团结一致的感觉，同时也产生了要反抗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的感觉。「在洛赫斯基的胸中激起了某种不熟悉的、没有体验过的强烈感觉，在美国的土地上，他第一次站在群众之中，这些人的感情是那样理解的，同时这些人的感情也就是他自己的感情……他忘记了他不懂得这个国家的语言，忘记了他没有护照，忘记了他在这个国家里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忘记了一切，他朝前走着，期待着什么，在孤独无助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和无数的群众在某种共同的感情中，他真是欣喜若狂，这种共同的感情汹涌地起伏着；宛如撞击着陡峭的河岸的波浪。」（引自侃瑞译「柯罗连科」，第34页）。

馬特威·洛赫斯基落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简直没有可以维持他生命的金钱了。但是当有人建议，让他出售他参加选举的投票权来支持某一个团体时，馬特威却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投票权不是为了是使人卖出賣它而属于一个人的。」

第二十五讲

马特威·洛萨斯基的形象之所以吸引人是在于他所表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点——那就是争取独立的意愿以及勇敢、善良、正直等性格特点。同时作者也指出可从旧俄罗斯乡村野蛮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落后的、消极特征——特别是自卑心理，但是由于相信了自己的力量，由于力求保卫和维护自己的人类尊严而逐渐克服了这种心理。

在90年代里，柯罗连科的最卓越的作品是中篇小说「盲音琴师」。小说的主人公——青年彼得·波波夫斯基生来就是一个盲人。关于盲人处于地位的悲剧性这样一个主题曾被许多作家写过，柯罗连科的成就是在于，他远不仅仅限于能艺术地阐明这一主题的心理方面，而是在社会方面解决了这一主题。

彼得·雷普斯是在家庭里教育起来的，家里人都爱他，保护着他。他从来没有想到物质上的艰难，围绕着他的是一片俄罗斯南方的美丽的大自然。孩子从幼童时期起就发展了敏锐地感知声音的能力，但是逐渐地他开始意识到在认识世界方面的他的能力的局限性，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他身上加强了与世隔绝的感觉，发展了力求隔群独处的感觉和暴怒的性格。他开始逃离人群，于是彼得·雷普斯的性格畸形地发展起来了。

导致性格上的这一切变化都应归功于他的教师——马克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加里宁。这位教师是一位老战士，是意大利人民解放战争英雄加里宁的战友之一。在争取自由的战役中，马克西姆失去了一只手，但是依旧保持着勇敢和善心的激情。现在他们想把他一个人教育得能够代替他遵循着「为被压迫者鸣苦」这一箴言去展开斗争。

马克西姆懂得，只有让彼得·雷普斯亲自经历人民的苦难才能加强他的精神力量。他引导他到像他一样的盲目的平凡人群中去。于是彼得·雷普斯背上背包，穿起褴褛的衣服和讨饭的盲人一

走到市集和街头去了。由于亲身经历了人民无限的苦痛，他的精神力量坚强起来了。「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随着他来的总是美妙、广大、无边无际的世界的新声音，这些声音现在代替了安分静止的王国里的端庄而使人感到的悠扬的声音……丧失视力的眼睛的眼界扩大了，胸襟开展了，听觉更加敏锐了；他……在草原的篝火旁过大夜，听到了市集和商店上的喧嚣声音，懂得了盲人，也懂得了非盲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止一次地紧紧地压痛着他的心……」

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而复杂了，这就引起了他要逃离人群，要使人们的生活得到那些热烈的愿望。

彼得鲁斯从幼童时期起就倾心于音乐了。他曾被很多次听到东大伊莫使用自己做的笛子吹出来的好妙的调子。这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好像光（笛子）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在那听得特别清晰的傍晚时候，他的感情上的每一种的感受，他的痛苦心情的每一种不同的程度，这时候都在他奇妙的笛子里震颤着，轻柔地从里面发出来，然后連續地响亮地奔放着。」

彼得鲁斯记住了许多民间曲调，音乐成为他的存在的一部分，在他身上觉醒了作曲家的才能。这种才能找到了出路。能够使盲目的青年走上有成就的生活的道路是无关的。这一道路就是音乐。小说是以这样的尾声来结束的，即在尾声里描写了盲音乐家，作曲家彼得·波波夫斯基撰出了他的以人民为题材为基础的美妙的即兴之作。「声音更响亮，更坚强，更完美了，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抓住了情感一致的，精神聆听的观众的心……真的，他表明了……在他的心灵里，一种艺术感觉代替了一己的，难以抑制的、盲目的痛苦，他感觉到了人世的忧伤和人世的欢乐，他表明了，他描绘使幸福的人想起不幸的人来。」

彼得被人民的创造力量鼓舞着，被他们的苦难和天才丰富

看，他就能够克服自己生活中的悲剧，变成了造福于人民的人了。

作者肯定了这一思想，一个人只有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才能感到满足，才是幸福的。只有当艺术是在人民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且为人民服务时，它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一个人脱离了人民而把自己封锁在「我」的经验里，不能够压抑「忧伤的利己主义」，不能够克服个人的苦难——那末他就只会趋向精神上的死亡。

年青妇女叶微琳娜帮助他战胜了个人的痛苦。她热烈地爱着这一个瞎眼青年，她成为他的妻子，以便在「人生的平凡功绩」里找到真正的幸福，找到足以证明自己的生活道德上是正确的根据。

整个小说贯穿著深刻的、细腻的抒情情调，有着哲学基础，表现了作者对人民影响力的强大信念。在这一部作品里充分表现了柯罗连科本人的感情和心情，他对平凡人的热爱。

柯罗连科力求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解决艺术中的英雄事迹的问题。他看到了努力「在群众作用的基础上指出个人的作用」乃是新艺术的任务。他断言，一个英雄应从「群众的英雄行为中汲取力量」。因此，柯罗连科力求证明，必须在平凡人的形象中，在平凡的生活中表现英雄事迹而又是往往抽象的条件中表现它。柯罗连科写道：「不要迴避平凡的生活，不要讚美日常的平凡事物……不，必须……投入在周而起伏着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瞧瞧它，研究它，竭力从其中找出可贵的东西。」

他认为，文学的新方向，必须把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1896年柯罗连科定居彼得堡，在这里他一直住到1900年。在这些年月里，作家患着很重的病——由于两个小女儿之死而

引起的神秘震荡。尽管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继续进行了紧张的写作，且参与了「俄罗斯的财富」这一杂志的工作。他又邀请了康普林、马明、西北墨克、维列盖那夫等参加杂志社工作，帮助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奇、波特雅烈夫等人发表他们的早期作品，读了几十位青年作家的手稿，帮助他们成长起来，且鼓励他们。

但是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俄罗斯的财富」这一杂志乃是民族派的机关报。在许多极为重要的论点上柯罗连科和民族派是有分歧的。但是同时他却没有和它决裂，而且还和这一流派的大活动家例如米哈依洛夫斯基是很接近的。结果，柯罗连科就无法正确地甚至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住在彼得堡的时期，柯罗连科主要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出现的。这一时期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首散文诗「火光」（1900年）。它表现了对光明日子即将到来的坚定信念：「终究……终究在前面……有着火光。」

1900年柯罗连科来到乌克兰，定居在波尔塔瓦，在这里住了二十一年。离开了彼得堡和那里的常年喧嚣的环境，在新地方作家感觉到舒服得多了。他写了「在哥萨克那里」的散文，这是根据他1900年在乌克兰旅行时所收集的材料写出的。此后发表了短篇集「西伯利亚的故事」（「严寒」、「最后的光芒」、「皇上的驛車夫」、「封地主」）。在这些故事里描写了西伯利亚及其居民，这一宽广而僻远地区的粗犷的但是美妙的大自然。

1903年柯罗连科制作了故事「并不可怕」，在故事里尖锐地批评了庸俗鬼魅和小市民习气。同年他认识了乌克兰作家M. M. 柯秋宾斯基。若干时日以前，在1902年，柯罗连科为